

2006.1.9.1

多元共生的 现代中华文学

Duo Yuan Gong Sheng De
Xian Dai
Zhong Hua Wen Xue

曹惠民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

曹惠民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曹惠民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2

ISBN 7-80120-186-8

I. 多… II. 曹… III. ①现代文学-概况-中国

②当代文学-概况-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717 号

● 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

著 者/曹惠民

责任编辑/李 旻

装帧设计/赵 松

版式设计/林 达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250 千

版 次/1997 年 11 月 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 7-80120-186-8/G·70

北京朝阳区

西坝河东里

定价: 15.00 元

写在前面

自 1986 年以来，因缘际会，在从事所谓的专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同时，我又先后介入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和“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那时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新构想还刚刚提出，学术界也正在大谈“跨学科研究”、“科际整合”、“新方法论”……我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我们这门学科的命运。我看到一种希望，同时也深感迷惘。

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通俗文学与纯文学（这里指过去我们所称的“中国现代文学”）由对峙到并存，台港文学与大陆文学由分流到整合，既是一种趋势和格局，也凸现了其多元共生共存的突出特征。或者这也只是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空观的一种个人理解。我希望一部健全、新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能容涵多维的审美空间与地域空间，以为如此才能对应已然存在的历史真实。

这本小书，我最想表达的就是整合和重构这段文学史的意愿。它不是一部文学史，当然还远远谈不上“自成体系”，但也力图结合宏观、微观和“中观”各层次，力图以宏观的视野提升微观的解析，而以微观的考察充实宏观的内涵，还力图有一定的覆盖面；估计一般读者不太熟悉的台港作家、通俗作家，或介绍稍详，而所谓“个论”，亦不求面面俱到。十

多年来，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积储的一些心得，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过，贯以兼容雅俗、整合两岸的同一视角，倒是“念念不忘”的。

新的文学史杰构，还寄望于来哲的大手笔。至于这本小书，倘若真能做成一块引玉之砖、一枚铺路之石，倒真是一种幸运了。

九十年代是一个忙忙碌碌、既令人振奋又令人伤感的年代。在世纪末的苍茫时分，还肯费时一顾这本小书的读者之批评，是我所期待所欢迎的。为此，我不仅感谢所有帮助我出成这本书的知名的朋友，也感谢所有阅读它批评它的不知名的朋友，只为他们都使我感受到人间的一种暖意。

曹惠民

1997年10月5日于姑苏城外蚕桑地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第一章 现代中华文学大视野	(1)
一、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	(1)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	(16)
第二章 现代中华文学面面观	(21)
一、“五四”气象：传统在行进中存活	(21)
二、乡土文学：永恒的中国结	(33)
三、现代派诗歌：从此岸到彼岸	(42)
四、通俗小说：三地生态的考察	(48)
五、实验性散文：现代散文的再出发	(57)
第三章 现代中华文学流派选论	(63)
一、“新月”诗派	(63)
二、“蓝星”诗社	(72)
三、沙田学者散文家群	(79)
四、香港“作联”之群	(90)
第四章 新文学作家选评	(105)
一、鲁 迅	(105)
二、周作人	(118)
三、叶圣陶	(123)

四、庐 隐.....	(141)
五、许地山.....	(154)
六、老 舍.....	(159)
第五章 通俗文学作家选评.....	(167)
一、秦瘦鸥.....	(167)
二、张枕绿.....	(184)
第六章 台湾作家选评.....	(189)
一、钟理和.....	(189)
二、张晓风.....	(194)
三、张腾蛟.....	(197)
四、陈冠学.....	(202)
五、许达然.....	(206)
六、吴 晟.....	(214)
七、粟 耘.....	(218)
八、萧 萧.....	(223)
九、阿 盛.....	(227)
第七章 香港作家选评.....	(232)
一、刘以鬯.....	(232)
二、董 桥.....	(240)
三、陶 然.....	(245)
四、黄维樑.....	(255)
参考书目.....	(263)
后 记.....	(264)

第一章 现代中华文学大视野

一、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

回首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繁富多姿，熠熠生辉。它正挟带着一个世纪的沉重、探索和辉煌，走向未来。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格局的建构确立，正面临着新世纪的呼唤。世纪末的中国学者和跨世纪的新一代学人，无可回避地必须应对这个挑战。

1. 问题的缘起

1985年，北京大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最早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①的新构想，从而引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

之后不久，复旦大学陈思和、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两位学者在《上海文论》主持专栏，^②建言“重写文学史”，也激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5期，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书。

② 《重写文学史》专栏始自《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止于1989年第6期。

尽管南北两地的这些学者，切入问题的思路或有不同，根据新的观念和构想撰著问世的一批著作论文，在同行中也有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既定秩序的消解与重构的吁求，已然呼之欲出。

既往的“现代”与“当代”概念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人为划分，依据某种评判标准所进行的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价值评判和文学史定位，以及凌驾于其上而附丽于社会政治尺度的文学史观念，似乎一下子都面临着新的学术时代的选择和再认识、再评价。

新构想的启示意义与贡献，今天看来，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当然，随着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展拓与掘深，随着学科格局的静悄悄的调整，一些新问题又提了出来。

不能仅仅把新的构想只看成时限的上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追溯到上一个世纪末来叙述），或者两个时段（1949年前、后）的接续、“打通”，但这个构想在“时间观”上的大幅度刷新，也确实是太引人注目了。

那么，从“空间观”上来思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包容着怎样的内涵，似乎就语焉不详了。最直截了当的质疑是：台湾、香港、澳门（且不谈“海外”）地区用中文书写的文学，该置于何地？

再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出现之前，人们可以追溯到的它的“前身”，就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其中，“新文学”的特指含义，是行内人都了解的：它与“旧文学”相对而言，而“旧文学”则包括了像“鸳鸯蝴蝶派”一类的“通俗文学”在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文学”，是否包容（或准备包容）“通俗文学”在内？在重写的文学史著作中，“通俗文学”有没有它的生存空间？

更困难的也更重要的是，倘使台、港、澳地区的中文文学，和

大陆及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加入了将被重新写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空格局，那么，文学史家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叙述策略来圆满地整合分隔已久、看起来各行其是的地域空间与审美空间呢？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眼下似乎还没有出现理想答案的苗头的难题。

但历史从来不会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

让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出发：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应当涵盖下列文学空间：

1.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新文学”（或曰严肃文学、纯文学），
 2.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通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俗文学），
 3. 二十世纪台湾、香港、澳门“新文学”，
 4. 二十世纪台湾、香港、澳门“通俗文学”（或曰“流行文学”），
 5. 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 甚至也不妨容涵一个特殊的、或可称为文学版图上“飞地”的部分：
6. 二十世纪海外华人文学。

从这样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空观出发，我们确认，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到2000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三地）存在的、包涵“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汉民族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这些不同型态文学在内的、用现代中文书写的中国文学。此一时期中国本土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可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①

^①“本土”是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三地。“海外华文文学”是指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及其后裔）以现代中文（华文、汉语、国语）写作的文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

2. 从对峙到并存：“通俗文学”与“新文学”

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一部“新文学”（或称严肃文学、高雅文学、纯文学）的发展流变史，丝毫没有“通俗文学”（它曾被认为是“旧文学”之一种）的容身之地：它被打入了“另册”，甚至是被革除在高雅的文学殿堂之外的。这种文学史观念的核心，是以“新文学”为正统、以“通俗文学”为异端。

如此相沿成习所写出的“现代文学史”，只是“半壁江山”，未可称为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全壁。因为它从根本上无视“通俗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客观存在。

这种反历史的文学观导致了一个重大的失误：恰恰抹掉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性特征。

文学的“雅”、“俗”之争，古已有之，而于今为烈。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雅”与“俗”，形成了此起彼伏、相激相荡的空前激烈的竞争局面。加之特定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和一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制约，以至形成了互相隔绝、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并各自建构了判然有异的两种不同的文学话语系统，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移位，呈现出文学新世纪的现代景观。

“雅”与“俗”，在二十世纪，划出了从对峙到并存的历史轨迹，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一方面是上承明清通俗小说的余绪，继续涌现出大量通俗小说，另一方面是因应社会变革的时势，有梁启超、章士钊等人的“新小说”、“政治小说”的提倡和问世。后

者显示出有别于传统观念（小说出于俚俗的街谈巷语，为迎合市民娱悦之需）的对于小说功能的新理解，开始形成小说领域内两种不同话语系统的对峙。

“五四”文学革命发生，鲁迅在“为人生”的观念指导下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凸现出崇高使命感的“新文学”小说，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改良社会、教化人生的功能；同时，对自晚清民初以来充斥于书肆的“鸳鸯蝴蝶”式的流行小说，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不遗余力的猛烈抨击，从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艺观到红男绿女、狐仙侠盗、黑幕秘闻的创作文本，统统给以彻底的否定。“为人生”派以社会使命感相号召，“鸳鸯蝴蝶”派以迎合市民的消费需要为招徕，形成两军对垒、互不相让的局面。

通俗小说阵营缺乏理论家，不能对新文学阵营作理论上的申辩或反攻，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它自有其相当广阔的读者市场，从而支持它能维持着与新文学阵营的抗衡，历三十年之久而不衰。自新文学运动发生到新中国的成立，这几十年间，“雅”“俗”对峙，成了这一阶段中国文学的基本存在方式。

但是，只是满足于这一观察，就很可能是肤浅的和皮相的。像世界上任何事物、任何矛盾一样，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情形，所在多有。需要强调的正是“雅”“俗”之间，不仅有对抗、对立，也有彼此时相消长、彼此隐然相通、甚至彼此趋近的迹象和事实。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既是传统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确实受惠于西方文学的刺激、影响。“新文学”的一代元老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与外国文学的种种关系，研究多多，兹不赘言。而被他们斥为“封建旧文艺”的通俗小说家们，于外国文学的译介也不无贡献。《礼拜六》的台柱周瘦鹃早在1917年就翻译出版了三卷本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被鲁迅赞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足为近年译事之

光”。^①而颇有趣味的是，鲁迅当时是以教育部金事兼“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身份褒奖周瘦鹃的。包天笑也译过《世界末日记》、《写真帖》、《六号室》、《天方夜谈》等不少西洋小说，他早在1901年与杨紫麟合译的《迦因小传》，更是继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最为风行的外国小说。其他不少通俗小说家也或多或少翻译过外国小说。看过或学步的，恐怕就更多。说通俗小说家也受到过外国文学的洗礼或在译介外国作品方面与新文学作家取同一方向，是有事实为根据的。

第二，也因此之故，通俗小说家在擢拔小说的文学地位时，既受到过域外文学观念的影响，也与他们的对手——新文学小说家尊崇小说、乃至视其为正宗的看法不谋而合。通俗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书写形式主要是叙事文体的小说，是个令人瞩目也值得深究的现象。小说因其对情节的注重、讲究，语言也较易于以通俗易懂的长处为读者所乐于接受，又比诗歌、散文更有趣味，成了二十世纪读者的宠儿。虽然“雅”“俗”两方面对于小说功能的理解各有倾侧，对于小说世界的营造各有规范，但在客观上却联手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建筑群落。

第三，通俗小说中有不少表现了反对封建专制、揭露军阀恶行、坚持反帝抗日、关注国运民瘼的主题和意识的作品，除了武侠、言情小说等类别，也有“问题小说”（如张舍我的某些小说），“讽刺小说”（如程瞻庐的某些小说），“国难小说”（如张恨水的某些小说），触及到时代和社会的现实；在《八十一梦》（张恨水）和《升官图》（陈白尘）之间，在《秋海棠》（秦瘦鸥）和《鼓书艺人》（老舍）、《风雪夜归人》（吴祖光）之间，在《春明外史》（张恨水）和《家》（巴金）之间……，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或那样的相通、相近之处。既然置身于同一的时空之中，通俗文学作家与

^① 载《教育公报》1917年11月30日。

新文学作家有着从民族意识到价值观念上的趋同倾向，是情理中事，也十分自然。深浅不同，纯杂有异，则并不能苛求。

第四，通俗文学家在新文学的批评里受到冲激，又从读者的不断变化的要求中获得启发，在创作手法上也越来越多地从外国文学（远处）或新文学（近处）借鉴、学习一些技巧，一则是丰富了通俗文学的表现方式，二则也是缩短了与新文学乃至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差距，虽有“赶时髦”（这本是他们的特长）之嫌，然而“雅”、“俗”趋同的意向和实践，总是顺应潮流与民心的明智之举。而在新文学那方面，也曾经几次热烈地探讨过“大众化”的路径。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更推出了像赵树理这样的典范，透露了向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汲取新生机的动向，也是为“新文学”（纯文学）寻求更多的读者和市场的明智之举。“雅”、“俗”文学的接近与趋同，在四十年代一度出现了喜人的态势。

“雅”、“俗”之间在对峙中的平衡局面和趋同态势，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被彻底打破、中止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并非由于某一方的强势存在或读者群“一边倒”的选择所致（他们是既看鲁迅、巴金，也看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的）。政局的改变，文化秩序的重建，新政权文艺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通俗文学一下子“销声匿迹”、“纯文学”得以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

通俗文学这一回可真的要“浪迹江湖”了。然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五十年代以后它在大陆几无立锥之地，却赖中国之大（也许是冥冥之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网开一面），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找到了继续存活的“土壤”，以另一种方式维持几近失衡的文学生态。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大陆，“通俗文学”经历了另一个三十年的低迷和空白。严肃文学则一步步地经由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到社会主义的文学，甚至还出现了“高”、“大”、“全”的阴谋文艺，走上了一条越走越窄的小路甚至“死胡同”，酿成了自身的

危机。

而在台湾、港澳地区，自二、三十年代起，当年在大陆出产的通俗文学作品就陆续在社会上流布（就规模而言，在香港甚于台湾）。及至五、六十年代，台湾、香港与大陆分隔的政治现实已基本呈现，海峡彼岸的文学生态在中华文化版图中开始随之出现一些与大陆本土不同的色彩，其表现之一，就是通俗文学的易地勃兴、走红，恰与大陆的低迷、空白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为通俗文学重返大陆文坛提供了契机。对通俗文学的认真、冷静的阅读和研究，逐步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文学歧视、误解的心态。台港通俗文学作品打入大陆市场，民国通俗小说“重出江湖”，加之新出现的一些当代通俗小说，合力形成了对严肃文学的有力冲击。文艺政策的开明，读者的多方面需求，传播渠道的多元化，都使通俗文学得以与纯文学共享流通空间。对峙被共存所代替。大陆的这种情况与海峡对岸的文学生态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趋同性。台湾社会政治上的变动也对文学的多元发展更为有利。香港文学在八十年代也有了纯文学更多的空间，一批面向香港现实的作品陆续问世，也呈现出空前的发展。

从两岸三地的中华文学的当代呈现来说，在二十世纪的总体格局中，还从来没有过像八十年代这样，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在如此广大的空间共存共荣，这是经历了几十年曲折与艰辛的探索以后，才出现的难得的文学生态的平衡，弥足珍贵。

3. 从分流到整合：“台港文学”与“大陆文学”

中华民族是带着国土分隔的历史伤痛走进二十世纪的：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使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1949年以后由于国共战争的结局，又延续了台海两岸睽隔几十年的局面；而香港、澳门也在上世纪末相继被割让给英、葡殖民帝国，疏离于祖国大陆本体。

这样的历史与因循而致的现实，当然深刻地规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和面貌，同一文化母体被生生切割成若干板块，呈现出同中有异的体相。如何认识台湾、港澳的文学发展造成的与大陆文学有异的“殊相”，如何确定它们在现代中华文学历史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便成了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观念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是源于同一文化母体，同一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半个世纪乃至上百年的分隔、分流，由同源分流而造成同质异相，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历史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又一特殊之处，也是它的个别性与复杂性所在。

台湾、港澳地区之有文学，其历史要比中原短得多，它的萌生是中原文化延伸的自然结果。明朝末年宦游台湾的文人徐孚远、沈光文留下了现今所知台湾最早的文人创作；港澳地区开埠甚晚，更要到本世纪初才渐有文人文事之出。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地倡导不久，它的影响就很快越过海峡。二十年代，台湾、香港相偕出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应。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创刊（后改为《新青年》，迁北京），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6年胡适在美国酝酿“文学改良”。1917年，胡适、陈独秀接踵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树起了“新文学”的大旗。

1920年，林献堂、蔡惠如等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在东京组织新民会，创办《台湾青年》杂志，提倡新文学。1923—1924年，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和《文学革命论》、《敬告青年》就被介绍到了台湾。二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亲受新文学运动的熏陶，还

曾拜访鲁迅并得到勉励。^①他在1926年出版的《乱都之恋》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其地位类似胡适的《尝试集》。至于台湾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鼓吹新文学的文章，更形成了一股热潮。此后，台湾新文学虽屡遭日本殖民当局的摧残、压制，但终究没有被消灭。

香港新文学的发动要稍晚一些。1927年鲁迅应邀从广州去香港，他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和《无声的中国》两篇演讲，在沉闷的香港文坛播下了新文学的火种。次年，张稚庐等创办《伴侣》，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带动了一批新文艺期刊的出土。继而又有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的成立，黄天石、谢晨光、倡伦等是主要成员。香港新文学的起步由此开始。在当时，香港作家最早接触并受到一定影响的是创造社同人的创作，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以及田汉的剧作等。至于民初以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当时的香港，也有一些学步者，创作过一批小说，显示了和大陆文学的另一层联系。^②

人员的交往是文学交流的直接方式之一。在日据时期，大陆到过台湾的作家只有梁启超、章太炎、郁达夫和本就在台湾出生的许地山等少数人，而有大陆经验的台湾籍作家则更少（如张我军、钟理和、林海音等）。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当时以推广国语为主要目的赴台的有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李何林、黎烈文、雷石榆等。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陆续到台湾定居而接续了台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血脉的还有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苏雪林、林语堂、谢冰莹、胡秋原、钟鼎文、纪弦、梁实秋等，他们的教学和文学活动，在意识和无意识间，扩大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一大批出生于大陆、相继在大陆和

① 参见刘登翰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参见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